

A Study of Sun Zhil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LIU Min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3, 2022

Accepted: February 22,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Min. (2022). A Study of Sun Zhil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75–18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0](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0>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by Sun Zhili was firstly published in 1990. Since then, Sun Zhili's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by various publishing groups for more than 30 times, and it is very popular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Sun Zhil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s vital for the publication of Sun Zhili's translation, because it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aders of the book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by bringing more people to the field; the reputation of the translator and sponsor in China's high-level education field is conducive to the introduction in that field; Sun Zhili's research and teaching habitus have also won high reputation for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Keywords: Sun Zhili;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field of high-level education of China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U Min is currently an MTI student of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Her email address is liumin20210831@163.com.

中國高等教育場中孫致禮《傲慢與偏見》 漢譯之考察

劉 敏

吉首大學



摘要:自 1990 年首次出版以來,孫致禮的《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取得了較大的反響,至今已重印 30 餘次。本研究遵照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對孫致禮的《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中國高等教育場的譯介情況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權力場域對教育場域的控制有所減弱,不僅催生了孫譯本,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孫譯本的受眾。同時,孫譯本從誕生之日起就在高校受眾中有一定的權威性,促進了其在高等教育場域的傳播。此外,孫譯本在高等教育場域的成功占位,還與孫致禮的科研與教學慣習密切相關。

關鍵詞:孫致禮;《傲慢與偏見》;中國高等教育場

一、引言

《傲慢與偏見》是簡·奧斯丁的代表作,在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這部小說的漢語首譯本於 1928 年由楊績翻譯完成,著名學者吳宓為該譯本作了序。此後,《傲慢與偏見》的漢譯本數量持續增多。本文以《傲慢與偏見》為關鍵字在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中進行檢索,並對檢索到的譯本資訊進行整理歸類,統計結果表明:截止 2021 年 1 月 1 日,《傲慢與偏見》漢語譯本有 400 餘種,參與《傲慢與偏見》漢語譯介工作的譯者有 200 余位、出版社有 200 餘家,其中不乏人民文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線裝書局等知名出版機構,漢譯本的種類龐雜,包括連環本,改寫本,譯寫本,縮寫本,導讀本,盲文本等。因此,對《傲慢與偏見》的漢語譯介情況及參與其中的譯者進行研究很有必要。

由於《傲慢與偏見》漢語譯本數量過多,參與其中的譯者群體過於龐大,對所有漢譯本及整個譯者群體進行研究難度較大,因此,本研究決定選取典型《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及其譯者為研究物件。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對從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中所統計到的資料進行進一步分析,發現以上 400 餘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中,有 30 余種的譯者是孫致禮。這些漢語譯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日報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等十餘家出版社出版。同時,為了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這些譯本形式多樣,包括單獨的漢譯本,英漢對照本及日漢對照本等。因此,本研究選擇以譯者孫致禮及其《傲慢與偏見》漢語譯本為研究物件。

二、孫譯本研究現狀概述

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目前還沒有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而國內學者對孫譯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策略與技巧賞析、運用傳統翻譯思想作為理論原則進行研究和以語料庫為工具進行多譯本對比研究。

孫致禮^①在其漢譯本問世後不久就發表了《我譯〈傲慢與偏見〉》一文,結合其漢譯本中的相關譯例,從忠實準確、生動傳神、曉暢自如三個層面論述了自己翻譯《傲慢與偏見》的指導原則與體會,拉開了孫譯本研究的序幕。此後,仝亞輝(1996)結合孫譯本中的典型譯例進行分析,認為孫譯本自然流暢,準確生動,筆觸清新活潑,深得原著的神采,又沒有絲毫生硬的翻譯腔,的確是一部非常優秀的譯著。何欣^②從敘事學中的反諷、戲劇化的敘事手法以及滲透其中的作品風格的視角出發,探討譯文與原文的對等情況,揭示孫譯取得

成功的奧秘。朱珊^③從翻譯策略的角度對孫譯本進行分析,探究異化策略在文化再現方面的具體運用,出在異域文化的傳遞以及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觸方面,異化翻譯策略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於以上關於孫譯本翻譯策略與技巧的研究通篇大多是對優秀譯例的賞析,評價的客觀性有待商榷。

郝軍^④從語言、風格和文化三個方面分析翻譯倫理對譯者主體性的影響,文章的關注點從文本轉移到文化和風格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李智^⑤以王科一、孫致禮、張經浩三位譯者的譯本為例,分析了 20 世紀部分中國譯學中的美學思想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探討了文學翻譯活動的本質問題、譯者的翻譯動機、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影響翻譯選擇的內外要素和目的。田傳茂^⑥從生態翻譯學角度考察了孫致禮《傲慢與偏見》重譯的問題,認為讀者對孫致禮重譯本的青睞,是對譯者和出版商重譯工作的肯定,是對翻譯群落中「適者生存」「強者長存」法則的印證。可以說,這是對孫譯《傲慢與偏見》研究的新嘗試,但是,由於全文涵蓋的名著數目過多,研究的範圍過廣,該論文對孫譯本的相關研究還只是涉及到表面情況,文章對孫譯《傲慢與偏見》文本之外的資訊,挖掘得不夠深入。總之,運用傳統翻譯思想作為理論原則對孫譯本進行的研究,對譯林出版社等社會實踐者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還不夠透徹。

韓紅建和蔣躍^⑦基於王科一和孫致禮的兩個人工譯本以及百度線上漢譯本與英語原著構成的一對三平行語料庫,從詞法和句法層面對比了人機譯本的 16 個語言計量特徵及風格特徵。蔣躍、張英賢、韓紀建^⑧採用了王科一(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0)、孫致禮(譯林出版社 1985)、張玲與張揚(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和張經浩(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4)的人工譯本以及百度翻譯的線上機器翻譯譯本自建了《傲慢與偏見》一對五平行語料庫,對比分析了英語被動句人機翻譯語言計量的特徵。唐一辰^⑨選取了王科一、孫致禮、張玲和張揚、張經浩、王晉華及羅良功六位譯者的譯本為素材製作了平行語料庫,描述了《傲慢與偏見》原著的語言風格、其在譯著中的體現及譯本自身的語言風格。總的來說,以語料庫為工具進行定量研究,在語言和風格研究方面,與傳統的研究方法相比,其結果更有說服力,但對文本之外的影響因素的關注與解釋方面仍有欠缺。

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標舉「關係主義」方法論原則,旨在消除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間的二元對立,是社會翻譯學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因此,本研究以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為基礎,以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場域」作為切入點對譯者孫致禮及其《傲慢與偏見》漢語譯本在我國的譯介情況進行研究。

三、高等教育場之範疇

「場域」是布迪厄受到物理學中磁場論的啟發,聯繫現代社會各個方面高度分化的社會現實提出的。「場域」作為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提出於 20 世紀 60 年代,但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才得到布迪厄的重視。《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一書記錄了布迪厄在芝加哥大學與一群研究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博士之間的交談,在書中,布迪厄稱,「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路(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於佔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Bourdieu, 2004:



133)^⑩。

從布迪厄對「場域」這一概念的定義中，不難看出，「場域」具有以下內涵：首先，「場域」中存在著社會關係網路。「場域概念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多面向的社會關係網路」，「場域基本上是一個靠社會關係網路表現出來的社會性力量維持的」(高宣揚, 2004: 139)^⑪。其次，「場域」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其相對獨立性體現在各個場域具有不同的「邏輯、規則和常規」(Bourdieu, 2004: 142)^⑫。再次，「場域」作為潛在開放的遊戲空間，其疆界是動態的，「場域的界限位於場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Bourdieu, 2004: 138)^⑬。最後，「場域」既是力量的空間，也是鬥爭的空間。「場域」中包含著各種正在活動中力量以及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場域」中各種力量之間的差距和不對稱是「場域」中鬥爭的根源，也構成了「場域」運作和轉變的原動力。

教育場域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參與者相互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以知識的生產、傳承、傳播和消費為依託，以人的發展、形成和提升為旨歸的客觀關係網絡」，「場域內的資本主要是文化資本，場域內的主要權力是以話語權力為表現形態的文化權力」(劉生全, 2006: 78)^⑭。高等教育場域由高校教職工、高校學生及其他高等教育實踐參與者構成，是教育場域的子場域。高等教育場域「關注各主體行為的結構性特徵，指向一種「鬥爭的領域」，既爭奪特定形式的資本，也爭奪合法性的控制權，每個行動者都試圖通過對資本佔有來改變其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乃至重構高等教育場域結構本身」(潘澤泉、楊金月, 2019: 86)^⑮。

四、高等教育場中孫譯本在中國的譯介研究

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我國高等教育場中的譯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文擬對其進入我國高等教育場的過程進行研究，以揭示孫譯本在我國高等教育場成功譯介的原因。而對於進行場域分析的三個必不可少且相互聯繫的三個環節，布迪厄(Bourdieu, 2004: 142)^⑯稱，從場域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場域位置。其次，必須勾劃出行動者或機構所佔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聯式結構，因為在這個場域中，佔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了控制這一場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相互競爭，從而形成了種種關係。第三，必須分析行動者的慣習，亦即千差萬別的情性傾向系統。因此，要對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這一文化資本在我國高等教育場的譯介情況進行解讀，需要遵循以下步驟：首先需研究高等教育場域與權力場的相對位置及關係，即權力場對高等教育場的規導與制約作用；其次要分析行動者，即孫致禮、譯林出版社、高校受眾等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最後要分析譯者孫致禮的科研與教學慣態對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高等教育場中成功占位的影響。

(一) 高等教育場與權力場的關係

在權力問題的探討上，傳統的實體主義思維聚焦於對統治階級這一客觀實在的群體的研究，而布迪厄則引入了權力場域的概念，來指代「社會位置之間存在的力量關係，這種社會位置確保它們的佔有者握有一定的社會力量或資本以便使他們能夠躋身於對權力壟斷的爭奪之中，而在權力壟斷方面的爭奪中，對合

法權力形式的界定權的爭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向度」(Bourdieu, 2004:348)^①。在布迪厄看來,高等教育場域是一個表面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場域,不僅受權力場域控制,而且還可以再生產權力場域。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吳愈曉、杜思佳, 2018:2)^②。第一階段(1949至1976年)可稱作高等教育的奠基階段,起點是1949年12月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該階段我國高等教育,雖然因為某些歷史原因而一度陷入停頓,但總體上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的教育體系已基本完備。第二階段(1977至1998年)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階段。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有恢復高考(1977年)、頒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4)、建設「211工程」和「985工程」貫徹落實黨的「科教興國」戰略。第三階段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我國1999年開始推進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2012年5月推出以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為載體,以創新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畫》(即「2011計畫」)。第四個階段是高等教育內涵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雙一流」建設作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內容。「雙一流」即「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從中不難得出以下結論:我國的高等教育場域受權力場域控制,權力場域的意識形態嚴重影響到高等教育場域;我國的教育場域歷來很受權力場域的重視,權力場域的不同行動者往往對高水準的大學有著不同的見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越來越大,高等教育場域的准入門檻逐漸降低。

(二) 譯介參與者間的關係

1. 譯林出版社與高校受眾

譯林出版社在高等教育場中的位置及其與高等教育場中的讀者之間的關係與《譯林》雜誌關係密切。《譯林》雜誌是由李景端1979年奉江蘇省出版局的命令設立的。由於編委會顯赫,囊括了「錢鐘書、楊絳、戈寶權、卞之琳、王佐良、周熙良、楊周翰、吳富恒、楊豈深、馮亦代、畢朔望、範存忠、陳嘉、戴錕齡、李芒等二十多位著名學者,後來又增添了蕭乾,全是譯界一流專家」(李景端, 2017:27)^③,加上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全國上下外國文學出版物僅有少數外國古典名著的老書供應,正經歷「書荒」,《譯林》以「打開視窗,瞭解世界」為宗旨,重點介紹外國當代文學。在選材上,要優先選擇緊密聯繫外國現實生活、可讀性強的當代流行小說「強調在保證健康的前提下,儘量做到「讀者愛吃什麼,就上什麼菜;當下百姓喜歡什麼口味,就做什麼口味。」」(李景端, 2017:27)^④,適應了高校師生對外國文學的迫切需求。這一切使得《譯林》從創刊後就在高校師生中取得巨大反響「創刊號是交給新華書店零售,初版20萬冊幾天就賣完,趕緊再加印20萬冊」明知還有人沒有買到,但考慮到紙張緊張,社裡決定印了60萬冊後就不印了。如今城市裡四五十歲的人,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大、中學生,幾乎很少不知道《譯林》的」(李景端, 2017:27)^⑤。《譯林》雜誌迅速取得高校師生的認可,稱為繼《世界文學》和《外國文藝》後的又一大權威讀物。憑藉著《譯林》期刊的信譽與口碑,譯林出版社1988年得以成立並迅速在高等教育場和高校讀者中佔據重要位置。

2. 孫致禮與譯林出版社

孫致禮1960年考入張家口外語學院(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的前身),畢業後留校任教,憑藉解放軍外國語



學院教師的頭銜以及自身過硬的外語功底，他在翻譯生涯開始階段就得到了譯林雜誌社的關注。孫致禮 1979 年開始做文學翻譯，他的處女作《愛情的安樂窩》(Love Nest) 是江蘇省出版局旗下譯林雜誌社的約稿，發表在《譯林》創刊號 1979 年第 1 期上。孫致禮的敬業精神和扎實的翻譯功底給當時的《譯林》編輯李景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次向他約稿，在 1979 至 1982 年，短短四年間，《譯林》雜誌刊登了孫致禮的《抽籤》《街頭女郎瑪姬》《一頓午餐》等 6 部譯著，其中《一頓午餐》和《獅身人面像》分別於 1984 年和 1985 年被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蘇人民出版社和《譯林》雜誌社聯繫緊密，都受江蘇省出版局管轄。1988 年譯林出版社成立，李景端成為第一任社長，由於與李景端熟稔且與《譯林》雜誌社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孫致禮 1989 年便開始與譯林出版社合作出版譯著。據統計，截止目前為止，孫致禮共出版譯著 24 本、專著 3 本、編寫教材 2 本，其中《譯林》雜誌社和譯林出版社發表、出版了他的 18 本譯著，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部專著。可以說，孫致禮是「曾經得到《譯林》的幫助而走上翻譯的道路」(李景端, 2017: 56)^②。孫致禮和譯林出版社交好，《Pride and Prejudice》又是孫致禮最喜歡的小說，在此基礎上，不難解釋譯林出版社在孫譯本的產生與傳播的全過程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3. 孫致禮與高校受眾

1960 年，孫致禮考入張家口外語學院英語專業，正式進入我國的高等教育場域，大學畢業後孫致禮留校任教，開始從事外語教學、翻譯和科研等工作，並先後獲得優秀教育工作者、傑出學者和著名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等在權力場域得到高度認可的頭銜，使其在高校讀者中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在與其他譯者和譯本的博弈中具備了較高權威性的優勢，對其《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我國的接受與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科研方面，截止目前為止，孫致禮先後編寫了兩本高校英語專業教程、出版了三部專著、發表了 60 多篇學術論文。若要對孫致禮《傲慢與偏見》在高等教育場域的譯介進行解讀，這些教程、專著、論文顯然是難以繞過的資料。本文研究發現，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頻頻作為譯例散見於他編寫的教程、他的專著與論文中。孫致禮編寫的兩本教程《新編英漢翻譯教程》和《高級英漢翻譯》分別作為「新世紀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系列教材」、「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系列教材」公開發行，其中《新編英漢翻譯教程》還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這就賦予孫致禮向各廣大英語專業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等高校受眾推銷自己譯本的機會。查閱以上兩本教材，很容易發現孫致禮翻譯過的包括《傲慢與偏見》在內的外國文學名著，不僅作為譯例頻頻出現，而且附有孫致禮本人的譯文加上翻譯過程的解讀。在此基礎上，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搭乘國家認可教材的快車，迅速進入高等教育場域，並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得到廣大高校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的認可。此外，與孫致禮關係密切的譯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部專著《中國的英美文學翻譯：1949—1966》《中國的英美文學翻譯：1976—2008》《翻譯：理論與實踐探索》。值得一提的是，《翻譯：理論與實踐探索》不僅收錄了孫致禮本人寫的《我譯〈傲慢與偏見〉》等關於其《傲慢與偏見》漢譯本的文章，而且將《傲慢與偏見》原著第一章和孫致禮對應譯本放在下篇實踐探索部分的開篇。前文已經提到，《傲慢與偏見》這本小說在我國知名度很高，但是譯本較多有 400 多個，而且權威譯本沒有定論，對於《傲慢與偏見》在高等教育場域的受眾而言，在孫譯本的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與自己不熟悉的譯本相比，他們更傾向於接受已經有所耳聞的孫譯本。

(三) 孫致禮的慣習

1. 科研慣習助力孫譯本之誕生

孫致禮作為高校教師的科研慣習促成了其《傲慢與偏見》漢譯本的產生與傳播。孫致禮不僅是一位高產的翻譯家，還是一位碩果累累的翻譯理論家。1988年，孫致禮「在綜合探索前人的翻譯經驗和自身成功的翻譯實踐基礎上，提出了翻譯中的十大關係，即辯證翻譯觀」(許宏、肖歡、朱錦平, 2019: 144)²⁹。同年，孫致禮第三次向譯林出版社表達想要重譯《傲慢與偏見》的想法，「並向《譯林》雜誌的李景瑞(端)主編表明決心：可以從四個方面超越王科一的譯本，其中一個方面就是他將堅持形似和神似的統一，以便於更好地保留「奧斯丁味兒」」(許宏、肖歡、朱錦平, 2019: 144)³⁰，在此基礎上，他才得以「圓夢」重譯《傲慢與偏見》。加之，早在翻譯《傲慢與偏見》之前，孫致禮就接受過文學研究和語言研究方面的訓練，他對「英美文學，特別是英國作家簡·奧斯丁，有獨到的見解」(許宏、肖歡、朱錦平, 2019: 18)³¹，並在外語類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其中《試評約翰·斯坦培克〈憤怒的葡萄〉》於1981年發表於《教學研究》；《重在傳神，貴在入化——簡評〈傲慢與偏見〉中譯本》於1983年發表於《中國翻譯》；《論〈諾桑覺寺〉的反哥特意向》於1988年發表於《教學研究》。在文學研究和語言研究慣習的影響下，他不僅在翻譯《傲慢與偏見》之前將「長達數百頁的原作翻來覆去地研讀了五六遍，同時還閱讀了專家學者為這本書所做的兩本注釋、作者本人的日記、後人為作者所寫的兩本傳記，以及大量相關的文學評論等」(陳秀, 2005: 71)³²，而且在譯本中「可以找到譯者序言或者是引言」用來「介紹作者、闡述作品的價值和意義，並提出譯者自己的看法和評論」(許宏、肖歡、朱錦平, 2019: 9)³³，有助於中國讀者瞭解原作者以及相關的英國文化。

2. 教學慣習助力孫譯本之傳播

孫致禮畢業後就一直供職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一直奮鬥在高校英語教學第一線，從事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工作」，截止2005年，「他直接培養的學生中，有9人現已成為博士生導師」(陳秀, 2005: 71)³⁴，基於這些貢獻，孫致禮先後榮獲「解放軍外國語學院首席教授(將軍級)」、「總參某部專業技術突出貢獻獎」、「首屆軍隊院校「育才獎」金獎」、「全國優秀教師」等頭銜或獎項。可以說，孫致禮的教學方式與教育能力在高等教育場中得到了高度認可。慣態「傾向於把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變成具有結構功能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Pierre Bourdieu, 1992: 53)³⁵。產生慣態的結構通過慣態指導實踐，這一過程不是機械決定式的，而是通過調節慣態作用的方向和範圍實現的(Bourdieu, 1977: 95)³⁶。作為教育工作者，孫致禮經常將自己的翻譯實踐融入教學中，並將部分實例整理出來，編入自己主編的教材。他主編的本科生教材《新編英漢翻譯教程》就收錄了多個將《傲慢與偏見》等自己的譯著運用於教學的實例。此外，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遠程教育與線上學習的地位迅速提升，高校會製作慕課供師生學習，作為名校名師的孫致禮也隨之具備了講授線上課程的機會。在講授線上課程時，孫致禮同樣將自己的譯作作為授課實例，並詳細講述自己的翻譯過程，作為其代表譯著的《傲慢與偏見》自然頻繁出現於他的線上課程中。與傳統課程相比，慕課又具有傳播範圍廣、受眾數量多、學習時間靈活等優勢。總之，孫致禮的教學慣習推動了孫譯本在高校英語課堂中的傳播。



五、結語

本研究遵照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對孫致禮的《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中國高等教育場的譯介情況進行研究,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場域與權力場的相對位置及關係,即權力場對高等教育場的規導與制約作用;其次研究了孫致禮、譯林出版社、高校受眾等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最後分析了譯者孫致禮的科研與教學慣態對孫致禮《傲慢與偏見》漢譯本在高等教育場中成功占位的影響。

研究發現:我國的教育場域歷來很受權力場域的重視,而權力場域的不同行動者又往往對高水準的大學有著不同的見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權力場域對教育場域的控制有所減弱,高等教育場域的准入門檻逐漸降低,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一切不僅催生了孫譯本,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孫譯本的受眾。同時,由於孫譯本的譯者孫致禮和贊助商譯林出版社等高等教育場域的行動者得到了權力場域的高度認可,孫譯本從誕生之日起就在高校受眾中有一定的權威性,促進了其在高等教育場域的傳播。此外,孫譯本在高等教育場域的成功占位,還與孫致禮的科研與教學慣習密切相關。

注釋

- ① 孫致禮:《我譯〈傲慢與偏見〉》,《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
- ② 何欣:《契合之美——孫致禮譯本對〈傲慢與偏見〉技巧與神韻的傳達》,《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 ③ 朱珊:《〈傲慢與偏見〉孫致禮譯本的異化策略》,《河北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 ④ 郝軍:《翻譯倫理視域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以孫致禮〈傲慢與偏見〉中譯本為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 ⑤ 李智:《文學翻譯審美選擇研究——以〈傲慢與偏見〉漢譯為例》,西南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
- ⑥ 田傳茂:《基於生態翻譯學的重譯動因研究》,《上海翻譯》2020年第4期。
- ⑦ 韓紅建,蔣躍:《基於語料庫的人機文學譯本語言特徵對比研究——以〈傲慢與偏見〉三個譯本為例》,《外語教學》2016年第5期。
- ⑧ 蔣躍,張英賢,韓紀建:《英語被動句人機翻譯語言計量特徵對比——以〈傲慢與偏見〉譯本為例》,《外語電化教學》2016年第3期。
- ⑨ 唐一辰:《〈傲慢與偏見〉多譯本翻譯風格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2018年博士論文。
- ⑩ Bourdieu, P.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⑪ 高宣揚著:《布迪厄的社會理論》,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⑫⑬⑭⑯ 布迪厄等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
- ⑰ 劉生全:《論教育場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年第1期。
- ⑱ 潘澤泉,楊金月:《高等教育場域中的文化再生產、階層分化與教育公平及其中國實踐》,《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1期。
- ⑳ 吳念曉,杜思佳:《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社會發展研究》2018年第2期。
- ㉑㉒㉓ 李景端著:《風疾偏愛逆風行》,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7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 許宏,肖歡,朱錦平編:《「尋找原文的回聲」:孫致禮翻譯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9 年版。

②⑥⑧ 陳秀:《求真路上的探索者——記著名翻譯家孫致禮》,《上海翻譯》2005 年第 3 期。

②⑨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 (Tran.). Cambridge, U. 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⑩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ichard N. (Tr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or: Zizle)